

【思想文化研究】

宗教神秘主义与犹太弥赛亚信仰探析

刘精忠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弥赛亚信仰最初并不占据犹太教的中心位置, 犹太神秘主义对其发展亦无实质性影响。16世纪始, 卢里亚喀巴拉、萨巴泰运动及近现代哈西德运动以宗教神秘主义特有的悖论方式使之凸现并最终融入民族精神之中。

关键词: 宗教神秘主义; 犹太弥赛亚信仰; 犹太教

中图分类号: B9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2) 04-0018-04

Jewish Mysticism and Messianism

LIU Jing-zhong

(The Middle East Research Institut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Messianism found no central position within Judaism at first, while Jewish mysticism also made no substantial influence on its evolution. However, from the 16th century on, it was highlighted by mysterious paradoxical methodology of Lurian Kabbalah, Sabbatian heresy, as well as modern Hasid movements, which eventually contributed to its integration with the Jewish spirit.

Key words jewish mysticism; messianism; judaism

一、犹太弥赛亚信仰的演变

犹太教救赎者“弥赛亚”出自希伯来语“受膏者”(Mashi'ah)一词,最早源于希伯来《圣经》中“受膏的祭司”这一称谓,意指祭司、士师和君王等神之使命赋予者。大卫王家族被视为弥赛亚的特选对象始于上帝与大卫立约时的许诺,犹太先知在外强威胁时也都曾预言将出现一位大卫家的君王统治国家。但这一角色并不仅限于该家族的后裔,希西家、所罗巴伯、甚至波斯的居鲁士等许多人物也曾被暗示负有这一使命^[1]。

犹太弥赛亚观念最初主要涉及重建的、乌托邦的和灾难性的内容,反映了宗教衍化过程中民族历史与宗教观念层面间的互动关系。救赎时代的到来首先将在大卫家族手中恢复国家独立,所有流亡者将回归故土,这是一个和平完美、没有刀枪的世界,许多国家的子民将云集圣殿,共同崇拜犹太人的上

帝。与此交织的是诸如死者的复活、最终审判、天堂、地狱以及个人和民族之奖惩等宗教末日论思想,因而也是一个完全陷入混乱和骤变的灾难性日子^[2]。这种超验的末日的灾难性因素在早期弥赛亚观念中似乎有一个极其庞杂的、难以具体辨析的缓慢演变过程^[1]。

第一圣殿时期,犹太宗教尚非一种弥赛亚宗教,弥赛亚信仰并不处于中心位置,“受膏者”一词也没有其后的内涵。从巴比伦流放时代起,弥赛亚观念逐步强化,并开始同“末日”论思想联系起来。第二圣殿时期,有关弥赛亚时代的冥想与激情愈加活跃起来,末日论层面开始获得愈发显著的重要性。弥赛亚即将到来以及死者复活等信条成了法利赛人信仰中的核心成分,但祭司贵族撒都该人则拒绝这一信仰。总之,弥赛亚思想始终占据这一时期伪经和托名著作的主题^[2]。

值得注意的是,弥赛亚内涵虽从最初的“受膏

者”获得了新的发展,但在整个这一时期,期待中的弥赛亚并未被看作是一位神性人物,而仅是一位拯救民众于苦海中的理想化个人。他的到来也不是一种神迹,虽然雅赫维的主宰地位将为所有人接受,公义亦将盛行世间,但人类本性并不会因为弥赛亚时代的降临而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从巴比伦归来时期的所罗巴伯到二世纪反抗罗马起义的犹太领袖巴尔·科赫巴,这一期盼被寄托在许多人物身上^[2]。正如任何观念都是对于外在现实世界的一种认识论阐释或诉求一样,宗教视角无疑成为早期救赎理想现实可能的表达途径。这一时期的主旨仍然指向民族现实历史层面中的生存问题。

唯一例外是第二圣殿时期的死海教团,他们自视为未来后启示世界中的社会核心,其弥赛亚信仰多少可能受到祆教影响,带有强调彼世的强烈色彩。他们相信在光明王子(一位弥赛亚式人物)和黑暗使者之间将会有一场最终决战,但这次灾难很快将以永恒拯救的到来而告终。他们显然注重神性审判的日子,而非现世生活中的民族整体性救赎。但这些观念在当时都处于犹太主流思想之外^[3]。

犹太弥赛亚信仰在历史上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很难想象,假如没有对弥赛亚救赎民族及个人于灾难的坚韧信仰,犹太民族何以能在灾难性的残酷历史中自适存在,并捍卫自己应有的尊严。作为一种历史范畴,犹太弥赛亚信仰的形成与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在漫漫长夜中,犹太历史上的诸多思潮都曾同其多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犹太教神秘主义自然亦不能例外。

二、犹太神秘主义与弥赛亚信仰的交融

从宗教的文化角度看,神秘主义者体现了人之最本真最朴素化的宗教气质,也是最纯正宗教精神的代表。如果说宗教思维本质要在对心灵不能把握之物的启示中寻找,那么对于理性思维而言,任何宗教都建于神秘主义灵魂之上,所有宗教的神秘主义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历史真实。

犹太教神秘主义二世纪左右业已存在,大致分为五个阶段:(1)古代后期《塔木德》时代的犹太神秘主义派别,主要思想在《宫殿书》和默卡巴异像中。(2)12世纪下半叶至13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欧洲早期犹太神秘主义派别,即中世纪阿什肯纳兹哈西德运动思潮。(3)13~15世纪发源于西班牙并传至欧洲和东方其他国家的喀巴拉神秘主义。(4)西班牙大驱逐后,16~18世纪以巴勒斯坦萨菲德为中心的喀

巴拉运动,包括卢里亚喀巴拉和萨巴泰运动。(5)18世纪的哈西德运动,以及近现代乃至当代的哈西德、非哈西德和反哈西德的喀巴拉学派^[2]。

犹太教神秘主义核心是其神秘象征体系。喀巴拉信徒承认希伯来《圣经》是全部真理的源泉,西奈神启反映了永恒真理,但同时坚信真正的真理超乎感性或逻辑之外,不可能为反映感性或智力经验物的语言所揭示或表达。《圣经》词语并不代表感性现实,它以某种复杂方式象征着从根本上超越于词语之外的神秘启示真理,信徒之职就是忠诚钻研,以获取神示的真实真理。最早的《光明之书》以及盲人以撒所使用的象征方式成为喀巴拉的标准语言,并在《佐哈尔》时代达到顶峰。

神秘主义经典诠释将《圣经》和《塔木德》著作视为某种神秘象征,试图通过对它们的诠释获取真正的神秘真理,而个人启示则毫不掩饰地通过异像、梦幻、启示或直观等纯粹个人宗教体验直接获取最本初的神秘发现。除早期《宫殿书》和默卡巴信徒倾向于后者外,后期喀巴拉信徒本质上虽不乏这类指向,但大体倾向前者(喀巴拉原意即传统)。从神秘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出发,不难理解其主要兴趣在于历史存在的起点或终点,即前历史的创造时期或后历史的救赎时期。在直到15世纪后期的前三个阶段里,神秘主义在犹太教中并不占据中心位置。

索伦教授认为,喀巴拉和弥赛亚信仰之间并无直接的内在关系。默卡巴信徒沉溺于灵魂自我的飞升体验,对加速救赎到来并无兴趣;后期弥赛亚期望相当强烈,但神秘主义者似乎从历史背景中逐渐消失;12~13世纪的哈西德运动中没有弥赛亚因素,虔诚者耶胡达本人坚决反对计算弥赛亚降临时间的任何想法^[4];13世纪格罗纳学派或《光明之书》中也几乎找不到弥赛亚因素,探寻个人如何获取神秘启示的“先知喀巴拉”亦复如此;《佐哈尔》虽以“上帝与其显现”的分裂或“放逐”来象征以色列的放逐,并且涉及弥赛亚以及西米安拉比等在救赎进程中的作用,但事实是喀巴拉在13~14世纪没有激起任何一次弥赛亚运动^[5]。

因而,将喀巴拉与弥赛亚信仰看作一对紧密的整体范畴,首先在于15~19世纪犹太教的浓厚弥赛亚期盼特征,神秘主义象征(主要是喀巴拉)至少发挥了部分推动力;其次,19世纪许多犹太学者(也有20世纪学者)相信犹太教是一种纯粹的一神论理性主义宗教,神秘主义被视为犹太教中不太适合的“边缘性”迷信成分,而弥赛亚信仰则反映了中世纪和现

代犹太教所受的迫害或灾难,如果没有这种历史遭遇,犹太人本身是理性的,不会为所谓弥赛亚的“胡话”所欺骗^[5]。

从认识论及社会历史维度分析,结果实际恰恰相反。神秘主义者虽然试图将其神秘知识与大众保持距离,但许多人同时也是正统犹太教的核心成员。《宫殿书》及默卡巴著作托名阿基巴、以实玛利及其他《密西拿》时代的先知,本身即暗示其作者在思想或文化上并非处于远离传统的边缘地带。中世纪哈西德运动得力于德国最显赫的卡罗尼米斯家族学派,而狭义上最早的喀巴拉学派、普罗旺斯的亚伯拉罕·本·大卫学派以及西班牙格罗纳的纳蒙尼德学派都是那一时代的哈拉卡学术先锋,其领导人也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塔木德》和《密得拉西》普遍引用神秘知识,也说明在古代后期至少有一部分犹太教领袖同样对神秘冥想抱有浓厚兴趣”^[1,6]。

神秘主义对犹太社会的影响从12世纪后期逐渐显露,信徒所做的许多道德短训至少说明他们认可普通人应当接受这些说教,耶胡达的《虔诚者之歌》和约拿·格隆迪拉比的《悔恨之门》都极富影响。16世纪,充满神秘象征术语的喀巴拉道德作品开始公开出版,至17世纪在希伯来布道文学中占据统治地位,逐渐渗入日常宗教和道德实践中,并演变为犹太宗教文化中的主导因素。在这一历史中,喀巴拉神秘解释赋予传统宗教戒律与道德标准一种魔力般不可抗拒的价值意义,而弥赛亚思想亦同样受到了神秘主义思潮的强烈冲击。现代哈西德运动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将之推向颠峰。

三、犹太神秘主义体系对弥赛亚信仰的诠释

卢里亚喀巴拉第一次实现喀巴拉与犹太弥赛亚信仰的真正结合。1492年大驱逐的阴影似乎暗示命运只能是一种“未被救赎”的灾难性存在。现世救赎中无法回避的灾难性使末世论弥赛亚观念占据了喀巴拉学说中心。较之昔日所追求的与末日救赎无涉的“启示之路”,喀巴拉信徒从对创造起点纯粹贵族化的个体体验第一次转向了现世和末世的时空范畴,即对民族现实问题的理论阐释与证明。这一努力本质上仍是一种内在的宗教神秘主义范式。

在卢里亚体系中,创世始于上帝自身的“收缩”,通过向内收缩或退入更深的自身之中,他在自身内为世界的产生挤出了一个原始空间。随后上帝身上流溢的光进入这个原始空间,由于光的冲击力太强,

有些地方圣光击碎了为不同流溢层特制的“容器”。为收起这些失落的圣光或“火星”,必须“修复”破碎的“容器”。这一“收缩”、“破裂”和“修复”成为对整个存在历史及民族命运的神秘诠释。“收缩”就是上帝的一种自我放逐,因而宇宙存在的第一次行动就是一种放逐,这和民族命运相一致;“容器的破裂”反映了创造或历史中不可避免的灾难性,“未被救赎的存在”本身就具有无法逃避的灾难性;历史就是上帝为“修复”破碎的“容器”以拯救“神光”的不懈努力,真正的神性统一不在创造开始的过去,而在“修复”完成后的末日^[6]。

在亚当之后,上帝将“修复”任务交给了他特选的亚伯拉罕和以色列民众,完成“修复”也就是结束整个世界、宇宙和民族的放逐。人不仅被赋予决定自身命运的关键能力,同时也决定世界、宇宙以及事实上神性世界的命运,甚至上帝的真实统一也要依靠人的努力。而宗教生活则是实现自身和上帝之救赎这一使命的主要途径。每一条律法、德行甚至每一个念头都是这一持续进程的一部分。犹太人生来就是这一神圣使命的一部分,即使皈依其他宗教亦无法改变。由是,通过与犹太生活与行为规范的接轨,卢里亚赋予“未被救赎”的生活新的意义和目的^[6]。

正如为宗教律法作出合法性论证与支持一样,卢里亚喀巴拉的神秘阐释使犹太弥赛亚信仰中压抑已久的外在现实性层面第一次得到宗教理论的内在认可与支持。宗教神秘主义与弥赛亚信仰的这一历史性结合在内心深处激起强烈弥赛亚期盼的同时,也使救赎信仰中一直模糊的宗教内在性层面通过神秘理论诠释及其广泛影响得以凸显并沉淀下来。至此,死海教团救赎中的彼岸色调成为犹太弥赛亚思想中的主流。

这一诠释的创造性在于,救赎本质上是以宗教行为为基础的神秘内在层面,而非现实历史中个体与民族命运的外在层面。假定宗教内在救赎与现实外在救赎的一致,缓解了“未被救赎”之存在的痛苦,也积蓄了爆炸性能量。17世纪的萨巴泰运动给这种内外一致的救赎理论无情一击,期盼背教弥赛亚从不洁中“凯旋”很快成了彻底绝望。绝望中“弥赛亚”的背教被解释为亲临“恶之王国”,以拯救失落在那里的“火星”,而犹太人生来就注定成为伪装背教的马兰诺,只能“踏着羞耻的外衣”寻找救赎,这是一种“神圣的罪”。

在背教弥赛亚之后,救赎的外部现实层面暂时已无可能,强烈的救赎冲动转向个体宗教层面上的

内向性释放,这种扭曲的神秘诉求缓解了宗教心理上的压力,却无法见容于正统。在内外救赎层面无法一致的情况下,这种竭力肯定内在而否定外在的宗教心理和价值倾向具有明显的悖论性质。萨巴泰异端即反映了卢里亚之后弥赛亚信仰凸显的宗教性维度的矛盾性,而对救赎之内在性层面的强调则成为犹太弥赛亚信仰最深邃处的灵魂。

但对异端行为的执著辩解或粉饰表明犹太民众拒绝承认弥赛亚救赎中的内外分离,拒绝割裂救赎在宗教传统与历史现实间的有机联系。于是,与基督教通过救赎观念的灵性化(个人灵魂的救赎)将其从历史王国搬到宗教的心理王国不同,犹太弥赛亚信仰始终坚持救赎必须同时是外部的历史事件,不接受将之置于个体灵魂之中以忽视其民族、社会和宇宙层面的态度,内外救赎的有机结合凝固为民族思维的独特范式。问题在于这种以宗教内在性为根本的弥赛亚信仰在历史中,事实上难以应对犹太救赎不可分离之统一性的挑战。

18世纪的东欧哈西德运动以鸵鸟方式回避了卢里亚喀巴拉以来的窘困,将救赎直接分为个体灵魂的救赎与弥赛亚救赎两部分,前者依赖个人虔诚的宗教行为得以实现,后者则由上帝单独完成,与任何个人努力无关。救赎仅仅是个人灵魂深处的事情,而非末日论的弥赛亚救赎或千禧期望。由此,回避了那种宗教虔诚可以影响现实历史进程的危险假设,将弥赛亚冲动转向全体性的内在宗教狂热,将现实痛苦暂时掩入一种莫以名状的迷狂之中。一定意义上,“个人生活的神秘主义化”在使喀巴拉成为民族精神之际,或许多少反映了弥赛亚思想成为犹太信仰之一的核心意义。

四、结语

纵观历史,犹太弥赛亚信仰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希伯来《圣经》赋予弥赛亚观念一种神圣的宗教气息,但弥赛亚期盼更多同放逐的灾难性层面联系在一起。拉比犹太教本身对救赎到来的必需条件并无多少准确叙述^[2]。而卢里亚救赎内外一致的神秘理论诠释强调了救赎的内在宗教特征,并以萨巴泰悖论方式得以强化。哈西德圣徒背弃了这一危险假设,却使神秘主义救赎期望融入犹太日常生活乃至

民族精神之中。

作为宗教精神最纯粹的代表,神秘主义对弥赛亚观念的神秘诠释同对律法一样,不可能去除其精神中的超验性宗教性质。拉比犹太教并不鼓励关注来世或惩罚,对弥赛亚观念的内在性层面事实上并无主导贡献。喀巴拉则使之具有彻底的末日论超验性质,其每一流派无论赋予弥赛亚祈求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其根本都是从个人灵魂或民族的内在宗教性救赎角度出发。这种前历史的超验的认识论维度在历史上无法回避冲突,并夸张地反映为一种凸显的张力。认识论及方法论差异上宗教文化整合与历史存在间的矛盾在犹太教这一特例中愈发尖锐。

犹太弥赛亚信仰在宗教神秘主义理论的权威诠释下,最终成为民族精神与希望的一大支柱,不仅反映了犹太教历史观的基本层面,其历史辩证法更意味着对自身、社会、乃至宇宙的观点。它阻止将未救赎时代的任何人类业绩看作是存在的最终结果,人的一切都是暂时性的、第二位的,一切将有赖于弥赛亚的到来得以改变^[7],在存在意义上,标志着希伯来文化中关乎存在之非理性范畴的民族性思维范式。突破这一悖论,将之融入“存在”中的现实历史,其转换是沉重的。

参考文献:

- [1] Green, Arthur. Jewish spirituality: From the Bible Through the Middle Ages [M].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1987.
- [2] Hecht N. 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 Sources of Jewish Law [M]. Clarendon Press, Oxford, US, 1996.
- [3] Schwartz, Michael D. Scholastic Magic: Ritual & Revelation in Early Jewish Thought & Mysticism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96.
- [4] 格舍姆·G·索伦.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 [5] Dan, Joseph. Scholem's View of Jewish Messianism [J]. modern Judaism Vol. 12, 1992.
- [6] Green, Arthur. Jewish Spirituality: From the 16th - Century Revival to the Present [M].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1987.
- [7] Biale, David. Gershom Scholem: Kabbalah & Counter-History [M]. Cambridge, 1982.